

第三次

中日青年论坛：

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
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前 言

蒋立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4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讨论会的中日双方代表共30余人，其中日方代表10余人，中方代表20余人。这些代表中老朋友居多，但也有几位新朋友，由青年论坛联系在一起的中日青年学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由青年论坛所促成的中日青年学者的交往在继续加深。讨论会上中日双方代表畅所欲言，辩论曲直，其热烈、认真的学术氛围给与会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1998年秋冬之际确定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时，国际局势尚显平静，而东亚地区却存在几个热点问题引人注目。为使中日两国的青年学者进一步深入交流对这些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促进东亚地区的发展，故而将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确定为“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

但出人意料的是，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开始了持续78天的对南斯拉夫联盟的野蛮轰炸，造成南联盟数千人死亡和2000亿美元的损失。4月下旬，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以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确立了美国联合日本控制东亚地区的霸主态势。北约则以美国为

首通过制定战略新概念，占据了称霸欧洲及更广大地区的有利地位。显而易见，美国的世界战略即以美—欧（北约）、日体制主宰世界发展的战略已经形成。尤其令人发指的是，5月7日美国的轰炸机竟然无视国际法，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了野蛮的集中点式轰炸，中国使馆被严重破坏，外交人员及新闻媒体人员遭受重大伤亡。美国的无耻行径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极为恶劣的先例。这场“一边倒”（南联盟无招架之力）的战争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宣传战和试验战，以此宣传其“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的“合理性”和美—欧、日称霸世界的“不可抗拒性”。此时世界的焦点集中在南斯拉夫，围绕南斯拉夫问题各大国均有举动，这是理所当然的。本次学术讨论会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不久举行，与会代表尚未能对此战争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故而提交的论文和会议发言均对此涉及不多，令人不无遗憾。

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实力为背景到处大谈特谈人权问题。应该看到，人权问题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问题。国际社会理应有统一的人权标准和内容，人权作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政治学概念，不能仅以民主权一个方面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而应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民主权、平等权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受教育权、劳动权、选举权、生育权、隐私权、迁徙权、信仰权、娱乐权、休息权等多方面内容。只有到达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人权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在此之前，人权标准只能是相对标准而不可能是绝对标准。各国的宪法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还应注意人权标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违反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权标准的行为，例如种族大屠杀，国际社会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这就是人权标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的差异、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别及历史传统影响的不同，各国解决人权问题的着力点必然有所不同，

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人权标准的特殊性。因此，任何国家没有理由将自己的人权标准作为普遍标准推向全球，以取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权标准，否则将不仅不利于各国人权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增加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就目前状况而言，可以说尚无任何国家真正完美地解决了人权问题。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着重于人权的民主权方面，但不是首先审视自身的民主权解决得如何，而是往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权解决得如何。实际上，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自身不仅在民主权、平等权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就是在生存权、发展权方面也有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限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理所当然地要首先专注于生存权和发展权，当然这并不等于在民主权、平等权方面可以无所作为。现实的问题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虽然其自身的人权问题并没有解决好，却以“人权卫士”自居，变人权为霸权的工具，动辄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就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通过限制、蹂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来维护其霸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表面上似乎是为了维护科索沃阿族的人权，实际上是要通过此举威吓与打击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人权观的南联盟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为确立美—欧、日称霸世界的体制服务。西方国家数百年来依靠戕害与剥夺后发展国家各国人民的人权发展了自己，历史与现实成为对西方国家惟我主义人权观本质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上小论权且当作本次学术讨论会的补充发言。可以预言，人权与主权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是受到国际问题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 32 篇，全部编入本论文集中，编

入时只进行了极少量的必要的删节。这些论文比较集中地围绕亚太地区尤其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展开议论，其主要议题有：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现状估计与调整趋势，建立东亚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框架的可能性，新日美安保条约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本质认识，朝鲜半岛局势对东亚安全的影响，东亚经济安全措施探讨，中日关系诸问题，等等。与会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既有基本一致者，也有针锋相对者。即或针锋相对，对立的双方经过讨论亦加深了相互了解，从而有利于今后各自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此欢迎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披阅本论文集，并可随时与相关论文的作者交流观点。

时至今日，中日青年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三次，已在我国的日本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与根本安雄先生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此向根本安雄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可以相信，有了前三次成功的经验，今后的中日青年论坛一定能举办得更好，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1999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按姓氏笔画为序)

- 丁 敏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丁 英 顺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亚非处
(100732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 小 川 彰 男 日本冈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101-0054 日本国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錦町3丁目
22番地)
- 小嶋华津子 女 日本庆应大学大学院
(100600 中国北京市建外日坛路7号日本驻华大使馆)
- 王 伟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
主任、副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王 新 生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冈本信广 男 日本贸易振兴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国東京都新宿区市谷本村町42)
- 仓田秀也 男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00-6011 日本国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ビル11階)
- 矢板明夫 男 日本松下政经塾塾生

- 刘江永 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100081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 刘家磊 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150076 中国黑龙江省道里区友谊路501号)
- 孙震海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李宇楠 男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 杨栋梁 男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30007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 佐佐木智弘 男 日本贸易振兴会アジ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国東京都港区虎ノ門2-2-5)
- 宋长军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陈建 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
(100872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175号)
- 松井完太郎 男 日本国际武道大学教养教育部讲师
(〒299-5295 日本国千葉県勝浦市新官841)
- 林昶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武贞秀士 男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第二研究部第三研究室
室长
(〒153 日本国東京都目黒区中目黒2丁目2番1号)
- 尚会鹏 男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教授
(100871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内三院)
- 牧野笃 男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464-01 日本国名古屋市长種区不老町)

-
- 周维宏** 男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100081 中国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号)
- 金熙德**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赵晋平** 男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00010 中国北京市朝内大街225号)
- 胡 澎**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铃木英司** 男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人教授
(100081 中国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号)
- 高 洪**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 崔 丕** 男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30024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138号)
- 程广中** 男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100091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2号)
- 鲁 义** 男 北京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00035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大帽胡同16号)
- 鲁学海** 男 延边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133002 中国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 臧志军** 男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200433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 蒋立峰**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00007 中国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目 录

第一篇 东亚大国关系调整与地区形势

世纪之交的东亚地区焦点问题	金熙德 (2)
决定 21 世纪初亚太安全的三大因素	刘江永 (11)
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对地区环境安全的影响	李宇楠 (20)
大国关系与亚太安全	程广中 (28)
建立东亚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框架的可能与困难 ..	臧志军 (36)
朝鲜半岛的统一与大国间的关系	鲁 义 (45)
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局势	丁英顺 (48)
世纪交替与日中、日韩关系	〔日〕小川彰 (56)
AU 理想和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周维宏 (65)
日中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日〕小嶋华津子 (72)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中日关系	王新生 (78)
新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关系	〔日〕铃木英司 (86)
《日美安保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宋长军 (95)
21 世纪日中关系展望	〔日〕矢板明夫 (102)
亚太地区两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孙震海 (110)

中美关系中的朝鲜·····	〔日〕 仓田秀也 (116)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政策初探 ·····	崔 丕 (125)

第二篇 东亚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差异

东北亚的战略构图——文化的冲突·····	〔日〕 武贞秀士 (134)
21 世纪东北亚经济安全与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 ·····	刘家磊 (145)
亚太区域化中的中国与日本 ·····	杨栋梁 (152)
中日经济关系中的问题 ——产业、贸易、投资 ·····	〔日〕 冈本信广 (160)
中日经贸关系及其特点 ·····	赵晋平 (172)
世纪之交的中日经济关系 ·····	陈 建 (181)
从日中电信业看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日〕 佐佐木智弘 (186)
21 世纪日本产业侧面观 ·····	丁 敏 (196)
日中两国是如何表现自我的·····	〔日〕 牧野笃 (203)
中日青年政治意识形成对未来国家关系的影响 ···	高 洪 (210)
“跨文化理解”与国际关系·····	尚会鹏 (217)
留学生与中日两国跨文化的交流 ·····	胡 澎 (228)
“德”和“职” ——再谈中日文化之差异·····	鲁学海 (239)
人口老龄化能促进东亚经济的发展吗? ·····	〔日〕 松井完太郎 (244)
人口老龄化与东方文明 ——以中日家庭养老为中心 ·····	王 伟 (252)

第 一 篇

东亚大国关系调整 与地区形势

世纪之交的东亚地区焦点问题

金熙德

人类即将迎来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21 世纪。值此世纪之交，展望东亚国际关系的未来，我们可以列举各种理由来为它勾勒一幅乐观的前景，但同时我们也确实面对着一些前程未卜的不确定因素。足以乐观的理由和尚难预料的因素都集中体现在如下诸领域的趋势之中：地区安全格局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经济危机的走势、文明冲突的潜在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概述，以期为中日学者展开讨论提示一个共同的问题范围。

一、冷战结束带来的新趋势

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给东亚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不是被淡忘，而是越发显示出其深远。

冷战结束带来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消除了笼罩在各国之上 40 余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阴影。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以冷战为主轴形成和演进的东亚国际关系，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环节都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这一转折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正在重新定位。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东亚地区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阵营划线的国际关系格局。1971 年以后，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出现对美苏两极格局作出了

部分修正。在冷战时期，东亚各国无不以某种方式在两极格局中进行自我定位，同时以此为本国的对外关系进行定位。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原有的东亚敌友关系体系瓦解，各国之间相互定位的最大依据消失。这一变化是导致各国间相互关系进入重新定位时期的基本背景。

——新型关系的主题是避免形成新的敌对关系。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之间在军事上两阵对峙，政治上相互隔绝，经济上相互封锁。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各国间关系的突出特点是敌友关系都相对清楚和稳定。苏联解体后，美国已不再面对全球性挑战对手，其他各国也已无须在两大阵营之间进行选择，因而可以在更为宽松的和平环境中构筑本国的对外关系。无论未来趋势如何，如何避免冷战型敌对关系重演，将是未来东亚国际关系调整的核心课题。

——未来趋势将是开放型的多极多元综合发展进程。在冷战时期，维护各自阵营的军事安全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济、文化等非军事安全问题以及领土争端、历史积怨等双边关系的“小道理”都服从于冷战需要的“大道理”。与此不同，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趋势，将是开放型的多极多元综合发展进程。“开放型”指不再以固定的敌友关系为前提，“多极多元”指不再形成以一国为盟主的阵营，“综合发展”指军事安全领域不再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

二、安全领域的新挑战

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东亚安全环境中的最大隐患，但它同时也给东亚安全环境造成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即，东亚地区面临着建立何种新的安全秩序的课题。

在冷战后时期，东亚各国间的安全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迄今为止，有关各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如，如何评价东亚安全形势的现状和未来？应以何种原理和方式建立和维护东亚安全秩序？如何看待美国在东亚安全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日益发展的中国？如何看待日本军事作用的扩大？如何解决本地区的各种热点问题？

90年代的东亚安全形势有喜有忧。喜的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这是冷战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忧的是，各国对本地区安全的思路和对策存在着严重分歧，从而潜在着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战略思路，东亚各国对设计本地区安全秩序的总体构思并不一致。1996年以来，美日重新加强双边安全同盟的举动在中国政府和学者中引起了疑虑。中国的关注焦点首先在于美日如何对待台湾问题。此外，美日的举措还涉及如下基本问题：东亚安全是否应建立在一国霸权和双边同盟之上？美日是否在试图构筑对外联合军事干预态势？日本是否在逐步改变战后体制而扩大对外军事影响？

在具体层次上，未来10年左右的中短期内，影响东亚安全局势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美关系能否稳定，是事关东亚安全大局的关键因素。苏联解体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变得异常突出，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偏离“日美基轴”路线，俄罗斯在短期内尚难恢复政治与经济活力，中国有望继续保持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在新的环境下，美国增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和施压力度。其对华战略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防止中国对美国的东亚地位形成挑战，二是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在此前提下，其国内存在着“遏制派”和“接触派”之间的对华策略之争。相比之下，“接触派”的主张虽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相对地现实一些，也较合理一些。如果美国采纳“遏制派”的主张，那么中美关系就将恶化，而

这势必成为本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朝鲜半岛局势能否缓和，是事关东亚地区稳定的热点因素。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出路，就在于通过朝韩对话实现民族和解与南北统一。但在南北对话尚难进展的目前条件下，最紧迫的课题是尽早实现美朝、美日关系正常化，结束朝鲜的孤立状态以消除其高度的戒备心理和防卫态势，使南北双方以对等的国际政治地位进行对话。如今，金大中政权已确立了鼓励美朝、日朝建交的方针。因此，美日两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显得十分关键。

第三，能否防止其他热点问题爆发，也是事关东亚安全的重要因素。这包括台湾问题、南沙问题以及本地区各国之间的一系列双边领土争端。鉴于目前的现实情况，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不宜急于求成，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则宜暂时搁置争端；急于改变现状和第三者介入，都将是有害无益的。

三、大国关系的新趋势

东亚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日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东南亚各国所组成。近年来东亚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是，中美日俄四边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

在中美日俄关系中，美国无疑具有最大的对外影响能力，对四边关系总体架构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首要作用。8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亚太政策曾透射出较强的经济优先取向，以“日本威胁论”为背景对日本频频施压；1994年以后，则带上了较强的地缘战略色彩，以“中国威胁论”为背景着手构筑防范中国的安全体制；1997年以来，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探索确立美中战略合作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日本的基本政策取向是辅助美国，欲借此在对华、对

俄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寻求在日美关系框架内逐步增强其对外影响能力。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抵制美国形成对华遏制体制，把反对美国一极独霸、推动多极化趋势作为长期战略；俄罗斯则由90年代初期全面投靠美国的方针转到了全方位外交轨道，但在总体上尚未积蓄起能够大有可为的外交能量。

中美日俄关系包含着美日、中美、中日、美俄、中俄、日俄六个双边关系。其中，日美同盟是最紧密的双边关系，但中美关系是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在东亚失去了昔日的影响能力，日本仍在坚持“日美基轴”路线，中国则从1989年以来承受着来自美国的人权、贸易、军售领域多重高压。在这种格局中，中美关系能否改善和稳定，便成为四边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近年来，日俄关系的新趋势引人注目。如果日俄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则会使日俄两国的外交回旋余地都得以扩大，这有可能推动四边关系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中美日俄关系包含着中美日、中美俄、日美俄、中日俄等四个三边关系。其中，中美日关系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大，中美俄关系次之，日美俄、中日俄关系再居其后。

在目前的格局下，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有所增大。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进展便受到很大制约；反过来，只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日关系就不大可能发生重大的对抗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不可能变得比日美关系更为密切，但在围绕世界与地区事务的战略合作方面，中美关系很可能将比日美关系具有更大的分量。

近年来，安全问题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再次突显出来。中美日俄都深切认识到在安全领域建立相互信赖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未来时期，台湾问题和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问题，仍将是中美日关系中的主要敏感问题。美国政府已采取实际措施致力于消除中国的疑虑，但其国内强硬派仍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各

种阻碍因素也将继续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美关系能够健康发展，中美日之间能够增进相互信赖，日俄关系继续得到进展，那么中美日俄关系就有可能朝着互不以对方为敌、各国都相互受益的方向发展，东亚国际关系就有望出现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良性互动局面。

四、东亚金融危机的警钟

截至1997年上半年，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曾倍受全世界的惊叹和赞赏。然而，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亚之所以受到世界瞩目，是因为一场猛烈的金融危机席卷了这一地区。迄今为止，人们就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归纳起来，这些原因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主要指巨额国际短期资金的投机性跨国移动，内因主要指东亚各国的金融体制中存在的缺陷。

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上对东亚经济的研究主要是谈论其成功的辉煌，以至于使“东亚模式”这一概念广泛流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自然引发了一场重新探讨“东亚模式”的大讨论。当然，即使在前几年，也已有人曾指出“东亚模式”的脆弱性，其中克鲁格曼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

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给东亚各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恢复经济和完善金融体制已成为东亚各国面临的紧迫课题。经济发展究竟有没有“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之分？东亚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特点是独特模式的表现，还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回答，不仅事关对东亚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解释，而且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对未来发展模式和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

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纷繁复杂，其中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其重要背景。经济一体化